

中阿“共生观”：从理念到实践的成功建构^{*}

马丽蓉[◎]

内容提要：“共生观”为中阿文明交往中的价值沟通奠定了坚实的共识基础。“以儒诠经”更成为中外文明史上一项独特的、合乎客观需求的创造，凸显出伊斯兰教义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间的“融合”，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探到了一条适宜的道路；中阿民众在“丝绸之路”上和合共存上千年所凝结成的“丝路情”已积淀成“传统友谊”，并形成互信的政治关系、互惠的经济关系与包容的人文关系等；如何在“丝路战略”框架下进一步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将是今后推进中阿文明交往的新目标。

关键词：共识 共生 命运共同体 儒家文明 伊斯兰文明 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马丽蓉，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

一、“共生观”：夯实了中阿价值沟通的认知基础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新安全观等，是一种旨在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全球价值观和新共生观。^①其中，中阿“共生观”即为两大文明和合精神的具体显现。

中国传统的“共生观”实为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1. 天下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天志”，顺“天意”、“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天下观天下”中的“天下”概念，涵盖了“天、地、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世界，一个不可分割的全球公共空间和资源，人类及其家园以及世界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2. 和合观。中华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必中节”、“四海之内皆兄弟”、“协和万邦”等，旨在倡导普天下的友爱与和谐、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人和”氛围、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的和平、禁武的“非攻”思想；3. 仁爱观。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中包含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倡导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折射出中华文化的宽容与豁达的品格；4. 义利观。墨子的“兼爱”思想直面义利问题，“兼相爱、交相利”，不仅成为决定天下治乱的重要因素，也因孔子将“义”视为处世立身之本而派生出“义利兼顾”、“舍利取义”的行为法则；5. 厚德观。由孔子的“为政以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以德治天下”思想，以及中华民族“厚德载物”的有容乃大的精神所组成的厚德观，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宇宙观，旨在倡导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遵循同样的规律，天道和人道之间一以贯之；6. 守信观。中华文明历来倡导“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与“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美德，孔子更强调“主忠信”，认为国无信不立、国之交当以信为本、信乃国家立世之根基。

同样，伊斯兰文明也由“和平与中正”的核心价值理念（《古兰经》2:143、2:190、17:110、25:6）派生出特有的“共生观”，主要体现为：1. “信经典”。《古兰经》论及“信经典”时，常以

^{*} 本文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GJ033）、教育部哲社研究专项委托项目（12JF01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GJW021）、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08JZD0039）、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和上海市一流学科政治学等成果之一。

^① 蔡亮：《共生性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的道、术、势》，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

复数词“库吐布”(Kutub)出现,意味着除《古兰经》之外还包括《讨拉特》(降示于先知穆萨,被视为《旧约全书》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和《申命记》等)、《引芝勒》(降示于先知尔萨,被视为《新约全书》中的《福音书》等)、《宰逋道尔》(降示于先知达乌德,被视为《旧约全书》中的《诗篇》等)。后三部经典在《古兰经》中被提到的次数分别是:《讨拉特》18次、《引芝勒》12次、《宰逋尔》3次等(35:25、57:25—26、87:18—19、35:31、46:12、6:92、5:44、5:46);2.“信先知”。《古兰经》将犹太教、基督教徒等泛称为“艾海来·克塔布”(Ahal al-Kitab),意为“信奉经典的人”或“有经典的人”,倡导与“有经人”开展对话、和睦相处(29:46—47),并承认穆萨、尔萨等也是安拉派遣的先知(16:36、2:136、2:253、4:165、13:7、43:6—7);3.慈善观。伊斯兰教的天课制度,渗透着“关爱弱势”的思想(2:177、2:219、2:261、9:103、8:41/17:26/2:177/2:215/76:8/9:60、57:7、9:60),且超越了血亲、种族、地域、国家和性别等阻隔,在平等、慈爱、尊严中折射出伊斯兰文化的“仁爱”品格;4.“两世并重”观。伊斯兰教倡导“两世吉庆”(28:77、2:200—202)、告诫人们“不要忘却你在今世的定分”以及“后世是更好的,是更久长的”(28:77、3:14、57:20、6:32、87:16—17、30:7)5.兄弟观。伊斯兰教倡导“天下穆斯林皆兄弟”,反复告诫“不要自己分裂”,强化教缘共同体意识(3:103、3:105、6:159、8:45—46、49:9—10),将血缘关系的兄弟情渗入其中(49:10—12),并强调穆斯林远离教胞都是罪过并受惩罚。

中阿“共生观”的话语表述虽各有侧重,但其承认共存、包容异己、慈爱行善、劝善戒恶、中道行事、和合与共等素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则是相通的,这“是一种愿景与期许,也是共生关系的落实和目标,目的是不断充实和平共处的共生内涵和完善共生观念,并使之向和平共生乃至和谐共生的高阶段发展”。^①也正是由于拥有相通精神的“共生观”,为中阿文明交往提供了坚实的认知基础,还为中外文明开展价值沟通提供了可能,如明末清初的“以儒诠经”运动即为明证。伊斯兰教所规定的念、礼、斋、课、朝等“五功”,“既是功修和制度,又是法定的宗教义务,被视为体现虔诚信仰的基石”。^②同样,中国传统社会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折射出中华文明“家国同构”的本质。其中,刘智、王岱舆回儒用中国的“五常”观来阐述伊斯兰教的“五功”,为儒伊文明开展价值沟通找到了突破口,尤其是核心理念的解读与共有话语体系的构建等,使得“以儒诠经”成为中外文明史上一项独特的、合乎客观需求的创造,凸显出伊斯兰教义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间的“融合”,伊斯兰文化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探讨到了一条适宜的道路”。^③所以说,“‘以儒诠伊’是我国文化史上一项独特的、合乎客观需求的创造,使古老的华夏传统文化与外来的阿拉伯文化交流和融合,它的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④对伊斯兰文明中国化的具体实践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阿文明的世界化与本土化、中阿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往等。

二、“传统友谊”:在和平、互惠、包容中结下的“丝路情”

中阿文明交往始于汉武帝时期,迄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并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进行交往,最终形成“官民并举”(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互促等)的一种基本交往态势,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等领域,并在不同时代凸显出迥异的内容与形式。

① 蔡亮:《共生性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的道、术、势》,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

② 林松:《古兰经知识宝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③ 孙振玉:《王岱舆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④ 林松等:《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古代官方层面中阿文明交往的主要途径包括：1. 使节往来。在朝贡制度支撑下，唐宋元之际阿拉伯使节的频繁朝贡，折射出中华文明以“华夷一体”的秩序原则对外进行文明交往的这一历史事实，并因“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中国历朝皇帝往往给贡使“回赐等值或价值更高的物品，并授官宴请”，因而“具有加强政治友好关系的意义”^①；2. 贡赐与市舶贸易。来华阿拉伯使节拿当地特产进贡，中国政府一律以礼相待，馈赠优厚。^②还大力发展了市舶贸易，在广州、杭州和泉州等国际港口设立了市舶司，负责检查进出船只商货、收购专卖品、管理外商。鸦片战争后，设立了税务司、总税务司管理海关诸事，大权落入洋人之手，中阿官方间的经贸往来基本中断；3. 偶发战争所引发的文明互动的客观效应。怛逻斯之役表明，中阿文明交往中偶发的军事冲突，“其交往价值不是表现在彼此间军事上的胜与否，而是反映在超越军事胜负的潜层意义上，即战争后果所引发的文明互动的连锁反应上”。^③

古代民间的中阿文明交往主要通过教旅、学旅和商旅等“三轨并存”的方式进行的：1. 教旅，主要是指来自阿拉伯—伊斯兰的传教士来华传播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远赴麦加朝觐的双向之旅，“推动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和阿拉伯，乃至西亚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增进了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友谊”。^④2. 学旅，主要是指中阿一些学者、旅人等编撰的见闻游记、地区考略。其中，“杜环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到阿拉伯地区游历的人，他的《经行记》真实可信，很有价值，是研究西亚北非古代史和中国与西亚非洲关系史的珍贵文献。他最早把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确切地介绍给中国人民，堪称中阿关系史上的瑰宝”。^⑤“《中国印度见闻录》是迄今我们知道的第一部记录中国情况，称道中阿友谊的阿拉伯文著作，受到阿拉伯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广泛喜爱。”^⑥《伊本·白图泰游记》则是作者来华考察元代风土民情的珍贵文献。郑和下西洋之伟大壮举被其团队成员所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藩国志》等作了最直接的反映；3. 商旅，是指往来于陆、海两条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安息、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开展跨境贸易之旅，大体历经：普通慕华者随商队或商船来中国—藩坊的形成—藩客巨富的出现—移民的流动等。即使明清之际中阿官方经济交往日趋衰落，但民间商旅一直未断。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阿三次建交高潮的带动下，中阿文明交往呈现出“官强民弱但成就显著”的鲜明特征，尤其是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不仅为新时期中阿开展多边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还标志着中阿文明交往的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目前该论坛已在正规化、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并在论坛框架下确立了“中阿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大力推进政治、经贸、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多边合作，并建立了部长级会议、高官委员会、企业家大会、专题经贸研讨会、能源合作大会、文明对话研讨会、文化交流、高教与科研合作、新闻合作论坛、环境保护合作、人力资源培训以及民间交流等12个合作机制。^⑦其中，关涉人文交流的多达7个，且“文明对话”成为论坛框架下的重要对话机制之一，为中阿双方开展行之有效的文明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支撑，中阿文明交往呈现出积极活跃的总体态势。

纵观中阿文明交往的悠久历史后发现，中阿两大文明在上千年的和平交往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如和平性、互惠性、包容性为主的交往特征、官民并举的交往态势、丝绸之路为主的交

①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②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③ 王铁铮：《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载《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④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⑤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⑥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⑦ 中国外交部亚非司编：《“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往途径、郑和等伟大先驱者所践行的和平外交思想等等，不仅对中国和平外交实践与理论建设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还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明并存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当然，中阿文明和平交往上千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既无历史恩怨，也无现实冲突，以及成功的儒、伊文明对话等理性因素外，中阿民众在两条“丝绸之路”上所凝结成的“丝路情”更成为重要内驱力：“通过丝绸古道传入中国的胡桃、胡椒、胡萝卜等，早已成为中国人喜爱的食物。阿拉伯鼎盛时期的文学经典《一千零一夜》，在中国家喻户晓。伊斯兰风格的音乐、舞蹈和服饰、建筑，在中国深受欢迎。同样，中国古代文化和技术，也传到了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造纸术，就是通过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的。六百年前，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多次到达阿拉伯地区，成为传播友谊和知识的使者。”^① 这份“丝路情”又使得“中阿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始终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历史上，中国和阿拉伯两大文明相互交流、借鉴，共同为人类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进入21世纪，中阿关系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中阿宣布建设新型伙伴关系、成立中阿合作论坛以来，各项合作机制日臻完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成果更加丰硕，极大地促进了中阿友好关系发展，中阿关系步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② 这种“传统友谊”在当代又体现为“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合作共赢的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并形成互信的政治关系、互惠的经济关系、包容的人文关系等。

事实上，中阿文明交往实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沙漠文化、河流文化以及宗教或准宗教文化等多种亚文化的借鉴和互补，两大文明也在交往互动中丰富了彼此的内涵，并以内化、外化等方式促成不同文明体间的互斥与互动。也正是在中阿文明成功交往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阿两大民族之间所结成的“丝路情”才尤为深厚与珍贵，现已转化为中阿人文外交的先在资源优势，并对中国人文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命运共同体”：丝路战略赋予中阿文明交往新目标

中阿文明上千年和平交往的历史，实为从“共识——共存”来建构“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建构的历史。其中，“共识观”是中阿文明和平共处的价值沟通基础，“传统友谊”是中阿文明共识与共存的社会情感基础。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2013年9月13日，习近平主席在上合峰会上倡导上合组织成员国沟通实现有望惠及近30亿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习主席强调“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上海合作组织6个成员国和5个观察员国都位于古丝绸之路沿线。我们有责任把丝绸之路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释放了同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信号，提出了行动路线图——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强调“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凸显“民心相通”的基础引领作用，带动上合组织由能源、安全合作向能源、安全及人文的全方位合作转变。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中国—东盟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

① 《温家宝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911/08/t20091108_20369027.shtml.

② 杨洁篪：《深化战略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写在阿拉伯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即将召开之际》，<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935741.htm>.

丝绸之路”，着重强调“坚持心心相印”与“坚持开放包容”的重要性，旨在表明“我们愿意和东南亚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上互惠、互利的联系”，以及“把我们和东南亚国家从郑和下西洋建立的传统友好往来也加入到现代经贸往来当中去”。^①因此，必须加强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郑和文化”、中国与东盟深化“传统友谊”的紧迫性等重大议题的研究，探索中国睦邻友好政策进一步深化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将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的合作由量的积累引向质的飞跃。2013年10月24—25日，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党中央为做好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确定了今后5年至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明确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习主席强调，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②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丝路战略”的正式诞生。

2011年7月由希拉里所首倡的美国“新丝绸之路”构想背后隐藏着深厚的地缘政治逻辑，美国的“丝绸之路”战略是地缘政治版的，中国的“丝绸之路”战略是地缘经济和地缘人文版的，前者旨在维护美国霸权利益，后者意在维护“命运共同体”利益，向世界展示出新一届中国政府“西进东稳”的外交战略格局，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抓手，也成为中国经营“大国外交”的重要战略支柱。

就中阿文明交往而言，“丝路战略”使中国对阿外交最终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只有盘活“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所蕴含的外交历史资源优势，才有可能使“传统友谊”真正发挥务实性作用。在两条“丝绸之路”上绵延千年的中阿文明交往，不仅积淀了一份深厚的丝路情感，还升华为一种丝路精神。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不仅使其成为中外文明交往史上的伟大先驱者，还因他近30年在28个国家留下的访问足迹而彰显了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郑和文化”已成为丝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也成为世界公共产品，并成为中国外交的宝贵历史资源，如何发掘并利用“丝绸之路”外交实践中所积累的“中国经验”，已成为如何盘活丝路战略历史资源优势的关键，也是“传统友谊”之于当代中外关系的意义与价值所在。为此，外交部长王毅在2013年12月访问巴勒斯坦、以色列、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沙特五国后提出对阿关系的“四个支持”，即支持阿拉伯国家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支持阿拉伯国家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支持阿拉伯国家与中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维护好自身的正当权益。这是中国的最基本立场，也符合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③

中阿文明交往，不仅有“共生观”作价值沟通基础，还有上千年和平交往所结下的“传统友谊”。如何在“丝路战略”框架下进一步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将是今后推进中阿文明交往的新目标。为此，以下几点前瞻值得期许：

第一，中国将在解决中东热点问题上发挥更大政治作用，进而深化中阿政治关系。中国将在推动解决巴以冲突、叙利亚危机、伊朗核问题、伊拉克重建等地区热点问题上进一步发挥“建设性作用”，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在巴以问题上的“四点主张”与王毅部长关于四方机制的“一个表态”，表明中国努力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的这份外交道义资源转化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举措，并

① 《习近平首次在东南亚国家演讲三故事开启海上新丝绸之路》，中国广播网，2013年10月4日。

②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

③ 《王毅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专访》，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16490.shtml。

因巴以双方均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且对中国都有着经济合作的现实需求,以及劝和促谈的中国中东问题特使机制的有效运作等,使得“中国方案”有可能成为破解巴以和解困境的新途径。只要巴以双方能够“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权利是和谈的前提,相互照顾对方的关切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相互换位思考是推动和谈的积极途径”^①,巴以和谈就有希望。王毅外长“三个相互”的提议,旨在最大程度兼顾双方利益中推进和谈,闪烁着中阿文明“共生观”的智慧光芒,使得具有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的“中国方案”更具可行性。

第二,中国将与丝路沿线阿拉伯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内涵与途径,以“正确的义利观”来维护中阿共同的经济利益。在密切能源、经贸等传统领域合作基础上,积极拓展在高铁、和平利用核能、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合作,加快中国—海合会自贸区建设等。在历史上,两条“丝绸之路”的汇合点就是西亚北非地区,这就为中阿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创造了新机遇,沿线阿拉伯国家将会受惠于市场、投资、增长、合作等“中国机遇”所带来的实在红利,尤其是在全球治理改革举步维艰之际,中国新一轮改革将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自由贸易体制,倡导“正确的义利观”,在与沿线各国的合作中仍要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力争做到重义让利甚至舍利取义,为互惠型的丝路经济观注入道义动力,以切实维护“命运共同体”的利益。

第三,中国愿为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进一步带动中阿人文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发展已由“给世界提供商品”向“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瓶颈发展阶段,在“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作用”^②的具体实践中构建多元、民主的国际话语体系、以贡献公共产品的方式深化文明交往中的价值沟通,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睦邻友好”、“韬光养晦”、“劝和促谈”、“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命运共同体”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使得“中国方案”已成为全球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令外界更加看好中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能力,“未来我们将得知更多有关中国对大国和地区关系和关键国际问题的定义”。^③就中阿双方均面临恐怖主义的严峻挑战而言,培育反恐共识已成为深化中阿人文关系的当务之急。因为,国际恐怖主义日益呈现本土化、分散化、网络化趋势,“基地”等恐怖组织蓄意挑动教派矛盾、制造族群对立,并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宣扬极端和暴力思想,使得丝路反恐、反恐压力陡增:在陆上丝路沿线地区,“若干国家的政治动荡和跨国界的民族、宗教、教派冲突,将对未来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也必将对中国在该地区迅速拓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造成严重冲击”。^④其中,“三股势力”与“基地”、塔利班等伊斯兰极端组织所致暴恐事件由境外向境内蔓延;在海上丝路沿线地区,也存在由多民族、多宗教纷争派生出的武力冲突,“基地”组织分支机构在东南亚一带的活动日渐活跃。因此,中国人文外交应综合根治恐怖主义,积极倡导共同、互信、协作的新安全理念,与丝路沿线阿拉伯国家的政界、学界与媒体开展交流,认清恐怖主义本质与危害,早日达成反恐共识,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共同塑造丝路安全与发展环境,以切实维护“命运共同体”利益。

(责任编辑 杜 澄)

① 王毅:《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3年9月28日。

② 王毅:《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3年9月28日。

③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北京集纳山川大洋——“中国梦”战略得到两个新外交构想的补充》,俄罗斯《独立报》,2013年11月15日。

④ 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7日。